美国动态（半月刊）

2022年7月4日（第263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拜登政府应走对华和解之路

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解战略可能无法让中美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但它不仅能避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直接战争，还能促使两国在气候变化、核扩散和大流行病等全球性问题上进行有限合作。不努力与中国接触、一味谋求威慑中国可能导致中美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对国际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

中美关系

美学者：美国处在输掉对华芯片竞争边缘

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网站 6 月 20 日登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的文章称，除非拜登政府采取行动，否则美国正处于失去对华芯片竞争优势的边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英伟达、高通和苹果等美国公司几乎将其所有半导体制造业务外包给了台湾地区。在半导体方面过度依赖台湾地区会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风险。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在半导体领域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 1990 年到 2020 年，中国大陆建成了 32 座半导体巨型工厂，同期世界其他地区共计 24 座，且没有一座在美国。此外，大陆生产世界上 70%的硅、80%的钨和 97%的镓，每一种都是半导体制造中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如果中国大陆在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上发展持久优势，将在基础技术方面取得美国无法匹敌的突破。对此，拜登政府应采取以下三项政策：

首先，美国应该加强半导体制造方面的能力。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简化工厂许可证的审批流程以及提供税收抵免来支持公司投入半导体生产行列。

其次，美国应利用其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说服台积电和三星与美国芯片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美国本土制造先进半导体。

最后，美国应加强研发与制造之间的联系。大多数技术创新都来自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国会仍在讨论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将在这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美学者设想中国版“克制战略”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 6 月 15 日登载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国际关系教授安德鲁·莱瑟姆（Andrew Latham）的文章称，如果崛起之路停滞不前，中国可能会采取“克制战略”，该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为其打造一个避难所。文章摘要如下：

“克制战略”是美国实行自由主义霸权挫败后的替代方案，旨在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更有限的目标。“克制战略”是通过审慎的再平衡和紧缩政策来维持美国的首要地位。实际上，“克制”的概念并非仅适用于美国，只要稍加修改，就能满足任何大国的战略需要。那么中国的“克制战略”会是何种状态？

首先，中国版“克制战略”与美国版类似，必须享有地区主导地位。美国的全球霸权始终建立在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之上。中国的“克制战略”将从确立其在西太平洋或东北亚的主导地位开始。简言之，若中国在该区域内保持永久防御态势，并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合围，中国就无法成为有效的“克制者”。

其次，中美两国的“克制战略”都促使他们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地区对抗霸权。对美国而言，这些地区包括东北亚、欧洲和波斯湾。对中国而言，除上述地区外，还有印度洋地区和北极地区。因为随着极地冰层的融化，北极有望成为连接东亚和欧洲的替代航线。

最后，与美国版类似，具有中国特色的“克制战略”将避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永久性军事部署，取而代之的是推诿策略，以及只有在友好国家无法维持稳定的地区局势时才采取的极为罕见的干预措施。

鉴于独特的地缘政治形势，两版“克制战略”又有不同。美国“克制战略”的重点是防止出现地区霸权；而中国的“克制战

略”将打破现有的、有利于美国并得到美国支持的地区力量平衡，打造一个避难所。中国是否会采取此般战略，以及该战略将对中美博弈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观察。

美学者：拜登政府应走对华和解之路

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解战略可能无法让中美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但它不仅能避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直接战争，还能促使两国在气候变化、核扩散和大流行病等全球性问题上进行有限合作。不努力与中国接触、一味谋求威慑中国可能导致中美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对国际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近日登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主任弗朗西斯·加万(Francis J.Gavin)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应寻求更审慎、安全的对华政策。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俄乌冲突引发了数十年来第一次大国危机，同时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机遇。危机是大国博弈的试金石，可以击破神话、暴露弱点、凸显优势；洞悉国家间均势、利益界定与对抗决心；迫使国家重新审视其长期政策，并根据新现实调整立场；最后，亦是最重要的，危机中脱颖而出的国家可重塑国际秩序。

俄乌冲突发展至今已充分表明，美国依旧具有中俄难以匹敌的优势。危机团结了北约，巩固了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俄乌冲突促使欧洲加强了自身防御，美国得以将军事力量集中在亚洲地区。面对上述优势，拜登政府可能会受到诱惑，想要借此引导人们关注中国问题。但他应该抵制这一诱惑，

并低调探索在新的国际现实下中美达成和解、实现互利的可能。

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解战略可能无法让中美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但它不仅能避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直接战争，还能促使两国在气候变化、核扩散和大流行病等全球性问题上进行有限合作。不努力与中国接触、一味谋求威慑中国可能导致中美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对国际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

面对未来力量平衡的不确定性，在美国仍具相当优势的情况下对华缓和可能会取得比持续对抗更好的结果。对此，历史上的古巴导弹危机为拜登政府解决中美关系困境提供了几点经验：首先，拜登政府需要制定一项更有说服力，可以赢得国会关键成员支持，还能安抚盟友的战略；其次，谨慎地找到一位既可以传达总统意志又受到中方尊重的谈判代表；第三，暂时搁置包括“台湾问题”等在内的争议性议题，停止有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寻求一条对华和解之路的胜算虽然不大，但拜登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在一个核世界中谋求和平。

CSIS 专家建言美国升级对台支持力度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6 月 17 日登载该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高级顾问简以荣(Ivan Kanapathy)的文章称，维持台海和平四十年的政策和规范已趋于“瓦解”，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应放弃对冲战略，转而联合盟友对大陆进行全面遏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996 年台海危机后的二十年里，美国倾向于与大陆接触，而非与台湾地区进行安全合作，这导致美国在此问题上失去了先机，且在威慑力不足的情况下越陷越深。鉴于台海局势的利害关系，美国除了加快提升台湾地区的军事能力外，还需要展现坚定

领导力，向大陆、台湾地区以及其他主要盟友表明决心，证明民主国家能够抵御“威权主义”浪潮的兴起。对此，作者为拜登政府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美国国务院应修改其日常政策表述以配合拜登的言辞和战略指导。竞争时代，美国不需要安抚，也不应该放弃叙事。美国应积极争取在台湾问题上的话语权。

第二，美国在台协会应大力宣传美国军方与台湾当局的互动，此举能提升大陆方面的风险感知。对外报道这些活动，不仅能削弱反美或疑美言论，也能增强台湾地区的信心与战斗意志。

第三，拜登总统应明确授权其高级助手在必要时切断或破坏对中国大陆的技术和能源供应。美国应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实施威慑，对激化两岸危险局势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全面封锁制裁。

第四，行政部门应与国会协商，确保前者拥有应对各种冲突或危机的有效竞争工具。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总统有义务与国会协商以应对“对台湾安全或社会或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无论该法案是否被正式援引，行政部门都应建立在没有武装冲突情况下能够及时应对危机的机制。明确表达和授予这些权力会影响大陆领导层的成本效益分析。

诺奖获得者：美国将输掉“新冷战”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 6 月 17 日登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文章称，美国似乎与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了一场“新冷战”，若美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领导世界，则可能输掉这场“战争”。文章摘要如下：

冷战以后，美国迎来了单极时刻。但随后的中东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其它事件都使世界对美国模式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政治和社会撕裂已渐成病态。美国不想被超越，但无论基于何种指标，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的事实无可避免。对此，美国会两党已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可能构成战略威胁。为减轻风险，美国应停止帮助中国经济增长。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新冷战”早在俄乌冲突之前就已经展开。美国在这场新的大国竞争中需要一套完整战略，还需要联结欧洲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在内的天然盟友来对抗中国。此外，美国还必须赢得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数十亿人的信赖。然而美国迄今为止的做法却无法令人满意。

首先，在新冠疫苗方面，美国造成了全球“疫苗种族隔离”（vaccine apartheid）问题，富国得到了所需的疫苗，而穷国人民则听天由命。相反，中国不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还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疫苗生产设施。其次，在气候变化方面中美两国的可信度差距更悬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仅继续排放着大量温室气体，也没有兑现帮助穷国应对气候危机的微薄承诺。相反，美国银行还助长了许多国家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最后，美国和欧洲一贯以道德模范自居，但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不再占据任何道德高地，也没有提供值得信赖的建议性意见。而中国擅长的不是说教，而是为穷国提供硬件基础设施。

冷战最终是靠吸引和说服的软实力赢得的。为了脱颖而出，美国不仅要说服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商品，认同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还必须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具体帮助，而不仅仅是轰炸机和导弹系统。

美国外交

美专家：美日应加强创新技术合作

近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网站登载该中心亚洲项目日本研究高级研究员栉田健儿(Kenji Kushida）的文章，为美日两国加强技术创新合作提出建议。文章摘要如下：

美日联盟从安全延伸到技术和创新领域符合两国利益。但两国需要克服一些挑战才能充分发挥合作潜力，不仅需要了解私营部门创造商业价值的行业逻辑，还必须协调两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总体来看，美日加强技术创新合作需要关注两点：

第一，美日应建立能共享的创业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合作的第一个挑战是确保有效资金流动，从而促进创新，激励私营部门，其关键在于实现创业生态系统互联互通。目前，两国创业生态系统的跨境合作较有限，两国政府可以为此提供支持。美国应尽快将日本加入投资审查豁免白名单，而日本政府也应避免出于短期政治考量而不愿为美国投资日本初创企业创造便利。

第二，美日应打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这对于保证两国政策目标符合技术商业现实至关重要。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分为三层：应用程序、平台和物理基础设施。美日在网络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应该考虑到这三个层次的信息安全问题。近来，日本自民党提议将云计算定义为关键国家基础设施，呼吁使用国内云计算处理政府敏感信息。而这些国内云平台是否能提供全球平台那般的信息安全保护仍有待商议。就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数据隐私问题上能为日本提供帮助。因此，政府在平衡国家安全关切的同时还必须意识到限制私营部门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孤立国内企业，阻碍全球化。

美学者：贸易自由化有助于解决美国国内通胀问题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 6 月 14 日登载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等人的文章称，高通胀是拜登政府的“政治负债”，推行降低关税等贸易自由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物价，对抑制通胀有明显效果。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执政一年来，拜登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措施，对进口的钢铁和铝保持配额，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等。拜登还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强化了特朗普签署的“购买美国货”行政令，限制联邦政府购买他国竞品。此外，拜登重启《琼斯法案》（Jones Act）以保护国内海运行业，而这导致波多黎各、夏威夷等地运输成本大幅增加、航运拥堵状况恶化。拜登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其付出了相应代价，美国民众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成本愈发高昂。鉴于保护主义高昂的经济成本，贸易自由化必须成为拜登政府抑制通胀的核心：

首先，削减关税和取消进口配额能降低美国企业和家庭购买进口商品的成本。若美国整体进口关税降低 2 个百分点，通胀有望下降 1.3 个百分点。尽管在通胀率达到 8.3%的当下，1.3 个百分点并不多，但却能让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节约 800 美元生活成本。

其次，若拜登政府更有野心的话，可放宽关于“购买美国货”的限制，进一步降低最惠国关税。要想迅速缓解消费者压力，可优先对生活必需品进行降税，包括乳制品、服装和鞋类等。总统还可以要求国会授权对其认为国内供应不足的产品暂停征收 18 个月的关税，例如婴儿配方奶粉、化肥和木材等。

最后，贸易自由化还可以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若美国坚持保护主义，拒绝其他国家自由进入美国市场，包括“印太经济框架”（IPEF）与“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在

内的经济安全承诺将不具说服力，其地缘政治效用将大打折扣。拜登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关税、增加进口配额等贸易友好行为向合作伙伴提供切实好处，增强合作伙伴对美国经贸倡议的支持。

美利坚大学专家：美国及其东亚盟友应尝试与拥核朝鲜共存

美国《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 6 月 21 日登载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兼职教师李钟恩（Jong Eun Lee，音译）的文章称，尝试与拥核朝鲜共存，确保双向威慑可能是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破局之道。文章摘要如下：

在试图实现朝鲜无核化的过程中，美国曾先后尝试过三种策略：威胁实施严厉惩罚的“强制战略”、包括经济援助和外交正常化等激励措施在内的“接触战略”以及等待朝鲜在经济孤立状态下自行屈服的“忍耐战略”。但以上策略均未实现预期效果。相反，朝鲜进一步提升了其核能力，使其更接近于能够向美国本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水平。对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盟友而言，朝鲜无核化的前景并不乐观。

对于朝鲜来说，俄乌冲突带来的教训可能是依赖国际安全保证的风险远远超过核武装本身带来的风险。近年来，随着朝鲜稳步提升其核能力，韩国和日本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担忧加剧，两国国内对发展核军备或在其国内部署美国核资产的支持有所上升。对于美国及其东亚盟友来说，实现朝鲜无核化一直是维护地区地缘政治安全的重要目标。若目前没有实现无核化的最佳策略，那或许应该采取另一种战略来维护地区安全。

与朝鲜的外交谈判往往处在“负对称”（negative symmetry）状态。朝鲜若放弃或大幅削减核能力，美国可能会暂停朝鲜认为的“敌对活动”，如韩美军事演习或在东亚部署战略资产等。然

而多年来，由于互不信任，双方都指责对方违背承诺，对单方面作出安全让步的风险保持着警惕。因此，此类谈判常面临阻碍。

鉴于此，另一种外交途径可能是实现东北亚安全平衡的“正对称”（positive symmetry）式谈判。美国及其盟友含蓄地承认朝鲜在核武器安全方面的战略利益，同时扩大集体行动以平衡和威慑朝鲜的核能力。这种外交途径应在朝鲜与美国同盟之间确保相互威慑的基础上进行。默许朝鲜事实上的核地位，美国及其盟友可以专注于限制朝鲜的导弹试验次数及其射程。反过来，朝鲜可以容忍美国扩大地区联盟和威慑措施，以换取后者安全活动的透明度和“不首先”发起挑衅的承诺。

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框架可能会加深朝鲜与美国同盟之间的安全鸿沟。当然，理想的安全结果是实现朝鲜无核化，而更现实的情况是拥核朝鲜与更强大的美国同盟之间达成战略平衡，这也将成为开展军备控制、解除制裁以及经济和人道主义谈判的基础。

新美国安全中心：重振美菲联盟以应对印太战略竞争

近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登载该中心美菲联盟工作组的报告，为振兴美菲联盟，提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力提出了多项建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随着美中在印太地区的竞争加剧，美国将愈发依靠地区内的盟友和伙伴。其中，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联盟关系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美菲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还因为菲律宾在“第一岛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随着菲律宾新总统上台，美国应重振在此前摇摇欲坠的美菲联盟。对此，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在安全和防务方面：第一，在即将举行的美菲第十届双边战略对话中启动部长级“2+2”会谈，通过会谈建立战略和

应急计划流程，提高两国战略和行动规划的协调水平。第二，恢复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协议的大胆愿景。美菲两国于 2014 年签署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EDCA）近来年在实施方面陷入停滞，两国应履行承诺，增加陆军和海军基地的协议站点数，允许美军轮换进入。第三，加强联盟承诺，提出基于菲律宾战略自主和“基于规则秩序”的共同战略愿景。第四，优先向菲律宾出售非对称防御和海域感应装备，例如陆基机动防空及反舰系统、无人机等。第五，加强网络安全合作，提高菲律宾官员对投资安全可信的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视。第六，美国应启动美菲日、美菲澳三边安全对话。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组成的综合网络能够实现更大的威慑目标。第七，美国应为棉兰老岛的和平进程提供支持。2014 年的和平协议和 2019 年棉兰老岛“邦萨摩洛”穆斯林自治区（BARMM）的建立在减少当地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功。美国应提高对自治区的资金投入和外交关注。

其次，在对外援助、经济能源合作、外交关系方面：第一，拜登政府应尽快与菲律宾新政府进行外交接触，确定其是否有意申请“千禧年挑战协议”（MCC）。新协议可侧重于可再生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疫情后经济复苏。第二，最大限度地发挥菲律宾在“印太经济框架”中的作用，加强美菲在数字标准设定等领域的合作。第三，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包括继续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向菲律宾增派美国公共卫生顾问以及军事医疗顾问等。第四，支持菲律宾液化天然气发展，并通过鼓励美菲两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帮助菲律宾减少现有能源项目的碳足迹。第五，在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宿务（Cebu）以及第三大城市达沃（Davao）增设美国总领事馆，促进更紧密的人文联系和更有效的战略沟通。

最后，在历史遗留问题方面：第一，修订菲律宾退伍军人权益补偿法，增加分配给菲律宾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资金。第二，在

霍洛岛（Jolo Island）为 1906 年被美军杀害的摩洛人建造和平纪念碑。

美国政治/其他

乔治城大学学者：美国应采取的半导体产业战略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网站 6 月 15 日登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科学、技术和国际事务项目的富布莱特学者舒巴姆·德维韦迪（Shubham Dwivedi）等人的文章称，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都需要采取行动解决当前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漏洞，以免沦为二流技术强国。文章摘要如下：

半导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逻辑芯片”（logic chips），这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必需品。然而，这些芯片的供应链容易受到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美国政府应该为这些芯片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对此，国会和拜登政府可采取以下措施：

美国国会应当做到：1）提供资助。由于半导体，尤其是逻辑芯片的供应链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一座先进的晶圆厂的成本在 300-400 亿美元之间，因此大量的政府拨款是必要的。2）提供税收优惠。国会应该为半导体行业建立联邦投资税收抵免（ITC）政策，不仅要降低半导体行业的公司所得税，还要将优惠延伸到芯片设计、制造以及上游的材料、设备和研究行业。

拜登政府应当做到：1）建立分配标准。国会立法通常只提供有关资助计划的高级指导，没有详细资金使用说明。对此，拜登政府应该为资金的分配制定标准，使其能够优先资助逻辑芯片。2）精简条例。美国国内关于工资、工作条件和环境保护的繁重

法规增加了芯片制造的成本，抑制了国内投资。拜登政府应该对某些涉及健康、安全和环境的法案进行国家安全豁免。此外，联邦政府还应与地方政府协调，加快对逻辑芯片供应链项目的审批。

美学者：最高法院的激进主义行动有损司法公正

近日，美国进步中心（American Progress）网站登载该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奥林斯基（Ben Olinsky）的文章称，最高法院的极右翼多数派试图推翻长期存在的权利和法律，这种激进主义将威胁公众对法院乃至民主的信任。文章摘要如下：

随着最高法院本庭期接近尾声，它准备做出一系列令人深感不安的决定，推翻长期存在的先例和法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收回美国人当下拥有的权利。目前法庭上未经选举产生的大法官们正在推进其极端意识形态愿景，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国家奋斗得来的进步化为乌有。不应忽视的是，这是特朗普提名的所有三名大法官共同上任的第一个完整庭期。

除了伤害美国人及其权利这一最直接影响外，最高法院在这一庭期内的种种司法激进主义行动还削弱了人们对最高法院作为重要国家机构的信任。尽管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但以下三项措施有助于保护民主：

首先，确保最高法院的非政治化。美国的民主正受到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仲裁机构，以不带意识形态的、中立的方式来依法解决争端。然而，这不是本届最高法院右翼多数派所遵循的方向。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官都必须进行自我反省，以确定意识形态目标的实现是否值得以损害法院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合法性为代价。

其次，国会必须考虑对法院进行重大改革，包括任期限制和

提高透明度等。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平均任期显著延长，这既赋予了他们比预期更多的权力，也导致了职位空缺的减少和不规律。因此，对法官进行任期限制十分有必要。

最后，国会和行政分支机构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必须考虑到法院的激进行为，以避免法院对这些法律的实施进行不当干预。

民调网站 538：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的消失预示着美国民主选举的衰落

美国民调网站 538（FiveThirtyEight）6 月 23 日登载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政治改革项目高级研究员李·德鲁特曼（Lee Drutman）的文章称，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的消失反映了党派两极分化的深层次原因，并使绝大多数美国人的选票变得毫无意义。文章摘要如下：

几十年来，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一直在稳步消失。四十年前，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会选区存在明显分票现象；三十年前，超过三分之一的选区存在激烈竞争。而据库克政治报告（Cook Political Report）估计，到今年 11 月将只有不到 8%的国会选区仍具竞争性。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政治极化问题，还会使大多数美国人的选票不再具有代表性。并且，当超过 90%的国会选区倾向于两个主要政党的其中之一时，地区代表将面对越来越强的党派性压力，这使得执政变得异常困难。

美国政治需要妥协。模糊的党派界限和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意味着更广泛的联盟，更像在“四党制”（four-party system）的情况下运作，包括自由派共和党人、保守派共和党人、保守派民主党人以及自由派民主党人。党群之间在意识形态上重叠较多。在此情况下，党派之间的协商和妥协得以蓬勃发展。然而，由于

政党的地理特性以及造成分裂的文化战争，基于意识形态重叠的跨党派政策协议正不断消失。相反，两党之间的仇恨已经开始主导美国政治，将主要政党及其选民拉向竞争的两端。

更重要的是，当竞争消失时，选区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的根据地，该地区的其他人被忽略，民众几乎失去了投票的理由。竞争激烈的选区或许不会产生温和派候选人，但能够吸引民众参与政治，而这种参与对社区而言具有宝贵的溢出效应，这个效应的意义远远超过民主选举本身。

“1·6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对共和党初选的影响

近日，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网站登载其治理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的文章称，“1·6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对共和党初选的影响有限。文章摘要如下：

在针对“1·6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举办的系列听证会上，特朗普的多位顾问作证称，他们曾试图告知总统他在 2020 年大选中落败。特朗普可能也知道这一事实，但决定通过坚持所谓的“选举被盗的谎言”来追求另一条更愤世嫉俗的掌权之路。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个“谎言”的讨论已经成为全国各地部分共和党初选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成为衡量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实力的另一种方式。为了更好地了解迄今为止所有共和党候选人针对“1·6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公开态度、在 2020 年大选结果上的立场以及对选举公正性问题的看法，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团体对 759 名共和党参众两院候选人进行了评估。

一、共和党候选人对“1·6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态度。从结果来看，只有 38 名候选人（占共和党候选人总数的 5.01%）发表了明确声明，认为“1 月 6 日是爱国者针对腐败选举进行的

合法抗议行动”；63 位共和党候选人（占总数的 8.3%）发表声明称“1 月 6 日是一次暴力起义/政变企图，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民主”。绝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约 87%）未对该事件发表意见。就目前来看，公开反对起义的候选人比支持起义的候选人表现更好，但仍有数场选举尚在进行当中。

二、共和党候选人对“2020 年总统选举”的看法。据统计，65 名候选人（占所有候选人的 8.56%）认同“选举被盗”言论，113 名候选人（占总数的 14.89%）认为，“应该对选举进行进一步调查，但不认为拜登的获胜是非法的”。正如预设的那样，只有极少数共和党候选人（14 人）认为拜登公平赢得了选举，567 名候选人（74.7%）没有提及 2020 年选举合法性问题。具体来看，那些立场较温和的候选人比接受“大谎言”的候选人表现得更好。

三、共和党候选人对未来“选举公正性”的看法。表达对“选举公正性”问题的担忧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立场。据统计，323 名候选人（42.56%）表示支持选举改革，收紧投票权，认为这将有助于防止作弊。只有 17 名候选人（2.24%）表示希望为人们提供更简便、更容易的投票方式和渠道。在此问题上，支持收紧投票权的候选人总体表现良好。

基于以上数据，有三点发现：首先，对于 2022 年的共和党候选人而言，“1·6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和 2020 年大选结果在他们心目中并不像在特朗普心中那般重要。其次，令许多共和党人感到失望的是，特朗普 2022 年中期选举的战略完全是围绕他自己及声讨 2020 年选举展开。这是一种“向回看”的策略，导致全国各地对特朗普的评价褒贬不一。最后，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的大多数胜利发生在深红色的州和地区。特朗普如今对人心和思想带来的影响和改变，远没有达到他在 2020 年激活那些最热情、最坚定的核心选民的程度。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 辑 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　　编：200020
电　　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